

■ 人才培养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5.01.007

大学层级化何以形塑自我位置感

——基于某地方高校本科生的纵向民族志研究



汪卫平近照

汪卫平¹,袁晶²,王治森³

(1.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创新创业教育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杭州 311121;

2.浙江大学 共享与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30;3.印第安纳大学 教育学院,布卢明顿 47405)

摘要:相比于重点大学和高职专科,处于中间位置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学生似乎更是学术和舆论的双重透明体。借鉴教育自传和纵向民族志的研究范式,基于对某综合性地方本科高校的长期质性研究考察(2021—2024),整合了布迪厄及后继者关注的“位置感”概念和批判教育学者主张的“符应原则”的核心框架,试图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本科生自我位置的认知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大部分学生均明确或隐性建构出了“中等/普通学生”的自我叙事。对其解释性描述话语主要涉及权利等级化和社会比较两种机制。面对学校等级结构的影响,他们有敏感的心理和早期的负面经历,自我调适与内心和解并存。更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院校分层的游戏规则,被院校等级制影响下努力的叙事所驯化。学校所处的高等教育结构位置及其文化体系与学生个体自身的位置感知形成映射关系,虽有另类案例,但大学层级化基本上烙印了不同层次的学生认知,并演变为被社会长期忽视的隐形机制和优绩主义秩序常态。

关键词:中等学生;地方普通本科;精英大学;教育自传;纵向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1007012

修回日期:20240922

基金项目: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学学术项目“何种课堂更能提升师范生研究性学习能力:基于杭师大本科生的实证考察”

作者简介:汪卫平,男,安徽黄山人,杭州师范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政策与学生发展研究;

袁晶,女,安徽芜湖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民工发展研究。

通信作者:王治森,男,四川广安人,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大学生发展研究。

引用格式:大学层级化何以形塑自我位置感:基于某地方高校本科生的纵向民族志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1):7081.

Citation format: WANG Weiping, YUAN Jing, WANG Zhisen. How the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hapes the sense of one's place: based on a longitudinal ethnographic stud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a Chinese university[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13(1): 7081.

国人常用“中庸”来形容自身“执中”的优良精神特征,但主流教育叙事却又抵触、忽视、歧视“平庸或平均”。优秀特质(一流、重点、学霸/学神、精英^[1]、拔尖^[2]、天才、绩优)天生就获得关注,再不济是底层(学困生、贫困生、学渣)。我们在哲学层面崇尚或鼓励中庸,但在学业领域却极度消灭“中间”。现行教育评价体系习惯将学生分层,处于中间的学生成了研究和舆论的“透明体”。受基层组织中对成员“先进/中等/后进”分类思想的影响,学生管理中也主要采取“抓两头与抓中间”的手段^[3],学校常用“中不溜秋”的孩子来形容孩子的表现。

《分类不平等:美国的分层体系》指出:“所有的社会体系都需要一套社会结构,由此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类别或层级。”^[4]高等教育纵向分层导致中国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差距越来越明显,分层带来明显的等级、资源和身份的鸿沟^[5]。学校层级化是否以及如何塑造学生的自我意识和位置感鲜有研究关注。无论是社会舆论关注度还是研究者兴趣使然,非重点大学从来就不是研究重心。在“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作为教育平等研究中关注被忽视群体的背景下^[6],作为研究者长期定向追踪研究的先期探索,本文尝试利用某地方“四非”高校(非“985/211”高校、非双一流大学、非双一流学科高校、非一本录取线高校)本科生的教育自传与叙事文本以及研究者的纵向民族志方法,考察处于重点大学与高职专科之间的本科生对于自身教育经历和位置感的自我叙事。本研究试图为我们了解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多元学生教育体验提供更完整的视野,为地方高校学生发展和实务性工作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一)学校教育:分层系统、绩效管理与优绩主义

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教育体系逐渐构建出了基础教育层级化^[7]和基于成绩的“单一维度”(unidimensional)学生分类系统^[8]。大学并不是均质一块,因其资源和关注度的不同,其本身也存在水平和纵向分层(horizontal and vertical stratification)^[9]。尤其是与大学声誉和质量相关的水平分层决定了学校层级,并衍生出多种大学层次类型的表述(精英和非精英、重点和非重点、国家和地方、高声望和低声望、名牌和非名牌),以及围绕差异而展开的学生就读体验、劳动力市场表现、与社会精英互动的多重比较。与学校分层相关的另一概念是具有社会建构意义的“平庸”,平庸在绩效管理主义的背景下显得话语尤为不正确。教育领域的“平庸”概念经常被人们用来表达对学校教学法和学校教育现状的不满^[10]。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平庸被定位为优点的对立面,或者缺乏“天生”的才能或能力。平庸体现了无知、非理智、低价值或缺乏才能和卓越性。在政府绩效主义管理原则下,平庸被认为是“低劣之物”,无论是在质量、绩效、技能还是阶层方面都是如此。

学校教育能够促进学生个体阶层流动,但也扮演阶层再生产的角色,通过成绩的标准看似客观地将部分学生排除到获得进入一些重点大学的机会之外。有研究者认为学校教育塑造“分类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因而是“社会等级排序的生产机器”(sorting machines)^[11]。有研究者从效率角度出发,认为教育的文化氛围更有利于迎合平庸学生^[12],学校应该进一步消除“平均教学”方式,破除“塑造平庸”(mediocrity)^[13]的绩点制度,转而以分层教学的方式照顾到不同学业表现的学生(ability-group effects),尤其要为成绩更优异学生或者天才儿童提供更前沿和有难度的教学内容。

来自批判教育学的研究者,尤以鲍尔斯(Bowles)和金蒂斯(Gintis)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学者提出的“符应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就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隐形功能。他们认为学校教育只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对应场域^[14],学校透过一套成绩和外在的奖赏制度来给予鼓励。工作的片段性被反映在学生们透过不断的、表面上功绩主义的等第和评估而来的制度化的且经常是破坏性的竞争之中。借着使年轻人适合一套类似工作场所的社会关系,学校教育企图使

个人需要的发展配合企业的要求。后续的伯恩斯坦(Bernstein)、布迪厄(Bourdieu)、阿普尔(Apple)等人则进一步回答“对应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将视角聚焦更微观的学校日常教育活动、知识、权力和课程(隐性课程)。阿普尔指出,学校在对儿童进行分类并进而给每个分类群体分配不同的知识、倾向和自我观的过程中给儿童贴上了标签,学校在其他更大的机构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由公立学校输入的标签,被法律、经济、卫生和团体机构所借鉴以通过与它的联系来界定个体^[15]。

研究者将学校教育功能归纳为“筛选”(selec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16]。筛选作用在于利用高度选拔性考试遴选更优秀的学生,而社会化在于使学生能习得相应位置意识和认同,特别是不同阶层、不同位置的学生应该形成其位置的相应价值观和意识。学业成绩还与社会评价体系紧密关联,关乎个体在道德层面的位置和社会流动的未来期待。在中国尤其看重“寒门出贵子”和“优绩主义”(绩点为王和学业至上)的文化情境中,相比于优等生,寒门中的非学业优等生会因为道德、文化层面对不努力、不聪明的鄙夷而遭受文化和心理的双重打击。所以,既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寒门贵子,即考入精英大学的寒门学生,就社会层面而言,他们是阶层流动“革命”的时代典型^[17]。

(二)中间/平均:学生分层与被忽视的中等生

西方关注“中间学生”的研究者基本来自两个领域。较早的一部分人来自教育领域,他们对学校引入教育测量统计后标准化成绩测验对学生能力的标签化影响以及产生的“平均学生”(average students/average-ability students)的问题比较担忧。他们认为,既有政策和学术界过于关注优等生、差等生,而处于标准线附近的学生却被忽视了。萨瑟沃恩(Southworth)最早质疑人们总是关注聪明和学习慢的学生,而忽视了中间的平均学生^[18]。布朗(Brown)在1987年出版了《教育普通孩子》(Schooling Ordinary Kids)^[19]。与之关联的是,《中国青年报》在2007年也开展了“被忽略的中等生”征稿活动。正如《平均的终结》作者所指出,基于高等教育的“平均标准主义”^[20],每个学生都可以被用来与所谓的平均值进行比较,并给出相应的“标准之上或之下”的定性评价。

较晚的一部分人是从事青年研究的西方学者,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关于青年“教育—就业过渡”主题的研究存在的“二元路线”(dichotomy of experience)导向问题。他们发现大量研究要么是关注最顶层(spectacular/successful)的优秀学生,要么是关注底层那些处于边缘或危险处境(at-risk/problematic)的青年群体^[21],而中间那些行为和表现中规中矩的青年则受到严重忽视,他们称之为“消失的中间群体”(missing middle)^[22]、“过得去的学生”(getting by)或是“普通孩子”(ordinary kids)^[23]。他们指出,研究该类群体有助于帮助人们对青年研究中所有群体过渡体验有一个更为完整的视角^[24]。与威利斯(Willis)的坏小子和循规蹈矩者这种“二分法”(以及“成功”和“失败”)不同,罗伯特(Roberts)等人尝试探索“中间立场”(middle ground),他们发现依然存在着介于“抵抗”和“遵守”之间的学生群体^[25],其行为也表现出中间立场的“矛盾和混合复杂”的心理。

与此同时,国内的部分一线基础教育教师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这始于他们对班级“第十一名效应”的经验观察,他们将“中等学生”称之为“沉默的群体或灰色的群体”等。课堂话语缺失^[26]和教育黑色地带并存,所以他们呼吁“不能愧对中等生”^[27],并要给予这群中等学生更多的心理辅导和课堂关注^[28]。部分关注“中等生”的研究无形中又带着“改造主义”色彩,以某种方式将“中等生”推向优等生^[29]。部分鸡汤类的书籍抓住了中等学生家长的学业焦虑,继续兜售中等生突围宝典^[30]。

(三)位置感:教育结构塑造个体意识

社会结构会塑造个体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心态和价值,个体对自身的定位(如何看待自己)对后续的行动、结果以及长期的人生轨迹都有重要影响,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位置感(sense of one's place)是关注学生心态的核心概念,最早来自戈夫曼(Goffman),布迪厄在关于社会空间和习惯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该概念。位置感指的是人对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在物理位置方面,还是在社会定

位和安置方面)的一种感觉。当社会空间以其他方式扩展或转移时,或当一个人移动到不同的社会空间时,此种感觉会发生改变。位置感也归属于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自我效能感等,例如自我意识(sense of self)会对个体的行为结果有深远影响。所以,后续很多研究将自我感知与社会不平等联系在一起。来自对小学的研究发现,优势家庭和学校的学生常常被教育自己是“优秀中的优秀者”(the best of best),而劳动阶层孩子则被教育要遵守规则和更自律地追求成功^[31]。

基于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案例研究发现,精英学生试图提供批判学校定位来确定自己的精英身份,以维持“象征性不平等”。他们更青睐通识教育,并批评其他学校过于学究,和旧世界联系过于紧密,过度关注聚会和体育,学生职业准备过于单一^[32]。他们只将金融、咨询和高科技工作定义为高声望的,学会并善于在“高地位”和“普通”工作之间划清界限^[33]。穆勒(Mullen)的研究发现,耶鲁大学的本科生以积极的方式追求大学中的自我塑造,而紧邻的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学生则期待从学位中获得未来就业和稳定感^[34]。与从增值性评价视角考察代际流动率^[35]相似,我们也认为精英大学学生的发展受家庭背景影响相对更大,相对而言,中间或以下学校的学生家庭文化资本相对薄弱,因而对学校有更多价值期待,所以这些学生受到学校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推测中间位置学校的学生可能更容易被学校结构及其对应的价值倾向所影响。

综合上述文献梳理以及中国本土化教育情境特点,本研究试图聚焦地方普通“一本”院校学生教育经历中的自我定位和自我陈述,进而关注高等教育分层体制(名义或实然)对学生自我认知(位置感)的影响。尤其是在等级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身处在资源和声望等均处于中等位置的学校,学生是否也将这种结构性叙事转换成自身的位置叙事?本研究将具体回答以下几个子问题:(1)他们关于自我位置的陈述内容为何?(2)解释性机制是怎样的?(3)个体对结构影响的回应是怎样的,学业和心理呈现何种特征?

二、数据来源和资料分析

能捕捉到学生“普通/中等”叙事的鲜明特点,得益于研究者及团队长期关注学生成长的经历,以及拥有不同层次学校中相对较长时段的学习与工作经历等优势。这使得研究者关注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校学生的自我定位和叙事以及对教育经历、体验的反思。研究者曾在东部某精英大学读书时参与大量本科生的访谈中(2017—2021年)。在2021—2024年,研究者进入东部某省会城市省属重点高校(“四非”,冠以“大学”校名,录取线为省内最低控制线一本以上30分)工作。一方面,研究者以教学科研岗的身份接触到H大学的诸多本科生,另一方面继续从事在精英大学(F大学)本科生的访谈工作。两个学校几乎同步进行的本科生访谈、教育叙事和自传的过程,使研究者对以H大学为代表的地方普通高校本科生的自我建构和叙事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为之组建了相应的数据中心和研究团队。东部某省被调侃为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洼地”,除超级旗舰型的Z大学为传统意义的顶尖高校,其他高校呈现断崖式落差。在国内各种大学排名以及省内传统认知方面,H大学排名在全省本科层面处于10名左右。因为H大学以师范与医学为特色,报考学生的生源也比较稳定,主要来自对“铁饭碗”有追求的中产家庭(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中小学教师、农村生源等占比较高),这与Z大学以及F大学生源成分相差较明显。

所谓“一本”“二本”更多是“坊间说法”^[36],并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同时存在的地域差异以及学校“升格”现象,使得“一本”“二本”的概念更模糊。2014年9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2015年起在有条件的省份开展政策试点。所以,本文所指“一本”是政策试点之前且在长三角主要区域都实施本科第一批次录取的高校。

借鉴并整合“长期的追踪民族志”(longitudinal ethnographic research)^[37]、“质性纵观研究”(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以及“长期的实地调查”(long-term field research)的多元范式,研究者及团队正在努力构建“长三角地方高校本科生学习与生活资料中心”数据库。作为该平台成果的初步探索内容以及位置感中具有自我意识的特点,从2021年开始,本研究以“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participant-as-observer)^[38]范式,研究者及团队开始系统性收集本科生个体的教育经历与感悟教育叙事以及“位置感”的自传文本。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两个部分:一是研究者借助相关教育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的机会系统收集了H大学300余份本科生教育自传和叙事文本(课程作业)以及相应的访谈文本;二是研究者基于浸入式的民族志和参与式观察的体悟与反思。

出于研究伦理考虑,我们对所有参与者都介绍了研究目的和后续处理技术,也获得了院系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文中我们采用匿名的方式保护学生的隐私。研究采用诸如成员检查、同行评审、研究者和学生确认(反馈)等4种策略以确保最终主题的可信度。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并不打算使用具有量化思维的扎根理论范式,而是借用诠释主义范式呈现受访者或教育自传叙事本人的原始话语。我们坚持质性分析必须以被研究者自身的体会和感受为中心,强调对个案的深描,关注个体对自身行为的文化意义建构。由于本身的教师身份,所以研究者在尊重亲密人员^[39]以及与青年学生^[40]的伦理基础上,充分认识并尊重研究对象的权利,承担对研究对象负责的义务,处理了与受访者的距离感,确保受访者在纵向研究中保持极低的样本丢失率。

三、个体自我位置感及其解释性描述

(一)“中间/普通”的定位叙事

与精英大学的生源基本来自地级市不同^[41],根据对H大学的学生家庭背景信息的梳理,可以发现,该校学生的家庭背景也基本处于社会的中产阶层。学生基本上来自省内非重点高中,或者是重点高中的非重点班。他们的父母也多是体制内公务员或教师等,来自县中和二中的比例相对较高。多数人对自身的定位是成绩波动大,小考不错,但是只要到大考就不行(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

H大学的学生对于自身定位的话语以中间为特点,涵盖了学业和心理两个维度:

重点高中的异类、普通高中的优胜者、勉勉强强、不上不下、差不多先生、一路小巫见大巫、上下徘徊的学生、人工小太阳、平平的中区学生、别人家的孩子、非常透明或者是几乎被忽视的群体、阿呆(或智力障碍者)、群星中暗淡的星、游入大海的小鱼。

正如有学生自嘲:“我在中学时代就像一个‘差不多先生’,学习中等偏上,但总是离下一个阶段差一口劲,性格也差不多,身高也差不多,社交也差不多。”(WZF)

该类学生对撰写教育自传有一种强烈的自嘲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名人才可以撰写自传,普通人怎么可能有机会去撰写教育自传?哪怕是研究者向其呈现某“985”高校的案例,他们也依然认为“铅字印刷的产品”过于前卫和新潮。当“小镇做题家”话题甚嚣尘上时,他们更自嘲“我们都够不上这个标准”。有两位学生的故事较为典型:

村口的理发店店长每次理发都要问我成绩怎么样,能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实际上,我高中的成绩是平平无奇的,县里最好的学生都在这里,我最多居于中间的位置。后来,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再也没走进过那家理发店,我非常清楚店长难免会问这问那,我不好意思。(LXY)

从小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相当优秀,但当到了一个大环境中,比自己优秀的人多的是,自己就没那么显眼,没那么优秀了,经历这样的落差从而陷入自我怀疑和迷茫。不过这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一批人可能处于普通人中的优等生和优等生中的普通人这样一个尴尬的双重境地中,是在一小片区域里能显得很闪亮,但是距离退远范围拉大之后变得黯淡的星星。(XYJ)

虽然研究者无法确证此种位置感对学生后续发展有何种积极或消极影响,但可以确认的是,由于学业带来的等级标签和心理影响将从基础教育阶段延续到大学阶段,甚至是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

(二)个体叙事如何被结构所影响:权利等级化与社会比较

1. 权利等级化

一种是附着于成绩之上而裹挟的权利等级化。因为成绩优异会带来多种回报,所以儒家社会形成了基于成绩的单一社会评价体系,处于等级顶端的学生往往享受权利的利好位置。中等生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中等位置是因为个体遭遇“下坡路的铁定律”。他们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成绩往往非常优秀,只是进入后期才开始“退步/逐渐没落和平庸”,因此形容自己是“小池中的大鱼进入到大池子”。他们在教育自传中流露出对小学和初中美好的怀念和向往。但对于这种“没落”他们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自身智商和努力不够。例如,他们经常会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于自身的严重偏科与前期知识积累的不足。

原本在初中名列前茅的我在高手如云的镇中却着实跌落到“中流”甚至是底层。以最开始入学考试来说,我的物理、化学成绩在班级中均是垫底,反倒是生物考了全班第一,这对于我这样在初中理科成绩一直领先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即便有着所谓我所就读的初中是全县资源最弱的农村中学这样的借口,我还是由于从小养成的好胜心和扭曲的性格而不能自我谅解。(HJD)

老师们在焦虑那些在[处于]所谓的“富中线”(就是能考上富阳中学的预估线,一般是以年级前30%的学生的分数为准)上下徘徊的学生,而我就是那批学生之一。我们每次大型考试,都会拉出每个人的各科成绩,进入“富中线”的那科成绩会被标注颜色,并且总分在“富中线”以上的人的名字会被标注颜色。(ZQ)

通过高中学校测试,将新生再次分成实验班与平行班,而实验班则是由初中那批提前班的同学组成,他们会参加竞赛,争取进入国家队获得保送资格,这个班清一色的“985”“211”,这就是分班的目的,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再根据班级分配教师资源等。这些,让本来就有心理落差的我更加无所适从,起点和评估就很真实地摆在那里,努力好像是唯一能做的事,差距[感被]深深刻进脑海。(WCW)

班级之内,也按照成绩进行座位排序,以一本/重本/清北序列分数线,对学生进行不同类型的标签化和“治疗”。另一种则是他们对宏观结构因素导致差距或等级化的感知。例如他们认为可能背后是城乡教育巨大差距等。后者的描述也符合我们常说的“大鱼小塘效应”(the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由于重点班或实验班而带来的资源和符号等级化,也会带来认知差异。

2. 社会比较机制

社会比较和经历的某种特殊遭遇在结构化中扮演重要作用。例如,家中总是以“别人家的孩子”^[42]来进行比较。恰恰是此种比较进一步确认对自身意识和定位的影响^[43]。学生自己也会认为,寒门中的优秀学生总是容易得到关注,但是寒门中的差等生却常常被认为是异类。有学生反馈:

学霸们不仅用自己的智力碾压我,他们还用自己井井有条的计划、使命必达的执行力、充沛的精力、一丝不肯放松的集中力狠狠打击着我。当我在期末考试结束想要和同桌玩五子棋时,他掏出必刷题接着练,沉稳而安静得像一块磐石……在当了多年的佼佼者后,紧张的高中生活、情绪问题、高考的失利,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平庸。期间经历过无数辗转反侧的夜晚,崩溃大哭的时刻……我开始直视这份平庸,坦然地和这份平庸共处,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天赋有限、精力也有限的普通人罢了。(LSW)

所以,成绩不太好家境也不好的学生,就容易把学业失败归结为自己的不努力和不聪明。再加上家庭遭遇父母婚变或离世等变故,学生的心态和性格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四、个体对结构位置的回应

(一) 敏感的心理和负面情绪

尽管大部分学生能意识(程度可能有差异)到学校层次带来的学生心态和认知的影响,但是在回应的策略上却存在 4 种相互区别的类型(如图 1)。在结构影响下,部分学生有敏感的心理和早期的负面情绪体验。正如三联生活周刊所做的“高考记忆”专题,有人回忆道:“92 年参加的高考,做了 20 多年高考噩梦,每年高考季,都梦到差几分落榜,哭醒吓醒。”本研究也发现该类学生普遍有较为敏感的心理特征,或因为高考发挥失利,或是他们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校园欺凌、家庭变故等。

我的成绩在学校里落在很后面……但我的目标是浙大,或者一些“985”“211”大学,我知道我的成绩考上名牌大学的机会渺茫,但我一直努力着,虽然有些没努力到点子上,学得很疲惫,我就像是一根绷紧的弦,我想那段时间我是有些抑郁的,交不到知心好友,到高考临近几乎不想和任何人沟通。最后只考了一个不理想的分数,选择了我曾扬言“我才不要去”的 H 大学,未来可能要当一个小时扬言“我才不想当”的老师。(CWM)

我开始惧怕每一场考试,无论大考小考,那种焦虑感就像藤蔓一样,融进我的血液,和吃饭喝水一起,成了我的日常。至今我依然能回想起高中那些失眠的夜晚,漆黑的夜里,我像面壁思过一样盯着墙壁,任由思绪横飞,我看不清那些墙壁是黑的还是白的,就像我看不清自己的明天一样。(SYM)

由于学业成绩波动和学习习惯的不稳定,或是他们自己认为自身有不好的学习习惯,对自己的现状有反思,但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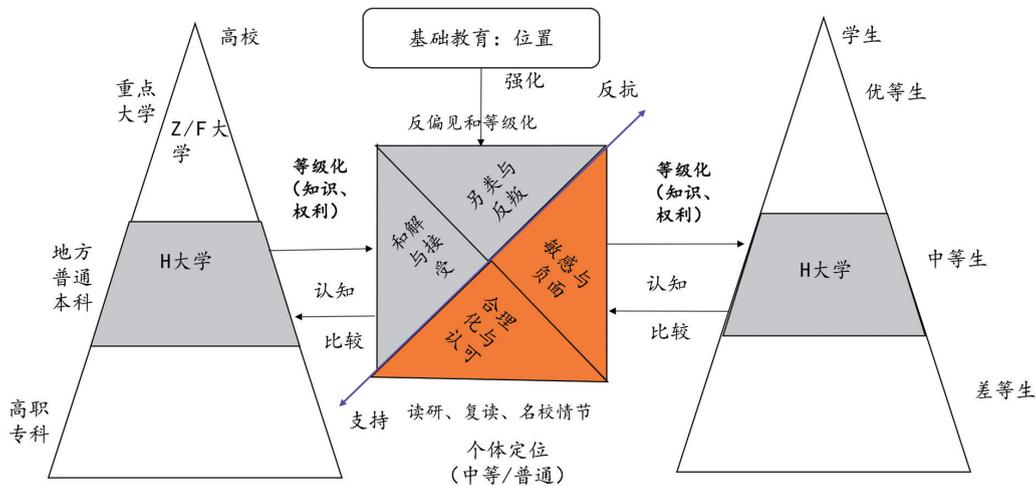


图 1 关于位置感的个体与结构的互动

(二) 自我合理化与认可

受院校分层逻辑的宏观结构影响,学生似乎也接受了学校分层的规则,并在内心深处合理化了此种结构,并尝试继续攀爬院校的层级阶梯。他们认可结构和等第划分的“优秀”逻辑,试图以学业努力来改变身份。

我对聪明的划分依据是数学的天赋。对数学天赋高的人,我往往有这样的感觉,处理问题上,我的反应能力总是不如他们,我的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也不如他们。这种感觉是潜移默化并在自我验证中不断累加和固化的。还有一点就是数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几乎所有领域都需要用到数学的逻辑思维。(LL)

因为我性格就是一个不太认命的人,我觉得只要不放弃自己,一切都有转机。我一直以来都不是

很聪明的学生,天赋也不高,我要靠主观的努力来弥补客观的差距,我比较会 push 自己。可能看起来结果相同,但是可能我会比较吃力。(JYT)

基础教育阶段成绩处于中等的学生,与曾经只差临门一脚的重点大学有过短暂的憧憬,所以他们更相信学业成功带来的道德意义,崇尚优绩主义,崇尚以分数论英雄,以数学为标准来衡量个体是否有天赋。无论是就业还是综合测评,他们“憋着一口气”,喜欢以不犯错误也不冒头的原则来做好每一件学业和工作上的事情。

(三)自我和解和接受

相比于前面两类(图中橙色区域),后续两类模式(灰色区域)总体属于“反抗者”。他们虽有不甘,但也可自我和解、接受自己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一边讲述着自己的学业退步史,一边又投入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在现有的环境中找到与自己的和解方式,主动放弃曾经要花费很大努力来维持的“好学生”的名号,也对目前的学校与境遇较为满意。虽然有研究认为过于技能对口的专业存在着阶层流动和通识教育训练的不足,但对于“反抗者”而言,正是出于对专业的热爱和受到社会感召,他们选择了自己真正喜欢或家庭认可且强调技能的专业,带着兴趣和喜欢,找到了意义与真谛。

世界一直在教我们成功,却没教我们接受平庸。教育,不应该是无数次错过。这个世界有太多人,常常要求我们出人头地,要成功,但成功的定义究竟又是什么呢?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答案。(LJJ)

我的时代还在向前延伸,我仍然要做一名成长中的老师,用真诚与温暖教育孩子们,不因岁月流转而成为精神荒芜。我想成为像树一样、郁郁葱葱、根深叶茂的人,继而立德树人,而后万木参天,亭亭如盖。(XYW)

H 大学像一个电梯,上面连着乌托邦,下面就是失乐园,如果一直不动或者自愿下沉,就会沉底,但是如果主动往上走,它也有上升的通道,我觉得如果有好的规划和用心挖掘学习资源,它可以看作一个很好的自我沉淀复盘成长的 gap year,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环境,取决于我怎么主观地运用。(JYT)

相比于“二本”学生,他们的学业抱负与职业规划更进退自如。因为他们大部分人拥有可比较的重要他人进入了重点大学,所以他们进一步深造读研的抱负较高。同时,家庭背景和专业优势又会使他们在毕业阶段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尤其是进入家庭中所指定或家庭优势的领域。他们不像“二本”学生那样破釜沉舟,因为他们有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和相对有前景的就业岗位,所以他们的进退相对更为自由。

(四)另类与反叛

虽然本研究聚焦权利等级化的影响,但是学校和家庭所给予的认知影响也在解构学校的等级化。因此,对于这种叙事也有抗争的声音,这主要表现在对中等叙事的批评。他们对此种结构位置的对应机制有着不一样的看法,甚至认为“中间叙事”的自我和解似乎也是一种不切实际。一位男生说道:

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却并不把自己认同为一个“中等”的人。普通与特殊相对应,但普通并不等于平庸。而“中等”这个定义却被一个严格的符号体系所规训着,在这种社会符号体系定义之下,所谓的自我和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社会分配结构是一个纺锤形,那么这种中间叙事的缺席对于个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并非如此,那么缺乏这种中间叙事的驱动力,以及当下各种优绩主义和传统教育观的渲染,学生会步入社会之后产生严重的割裂感……我在互联网上见到的“中等叙事”更像是试图阶层上升而失败后产生的反差和自怨自艾。(ZDR)

遗憾的是,研究者所接触的学生能有此种敏锐观察和反思的寥寥无几,而且此种认知的影响似乎是来自家庭文化资本的支持。大部分学生主要精力在于打磨未来的工作技能和忙于处理社团、社会

实践、绩点、体测等事务中,更不用提对自我概念和位置感有何想法和反思。

五、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主要结论

宏观社会或体制结构是否以及如何塑造个体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学校教育体系如何复制社会不平等是教育社会学的主流话语。换言之,学校所处中间位置的结构特征,是否以及如何转换成学生“中间”位置的表述?本研究借鉴长期民族志研究方式,以东部某地方“四非”高校(H大学)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关注中间位置的学生如何建构自身的定位和叙事。有研究指出:“能获得社会权力和尊重(医疗、法律、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向优势社会群体提供,而那些被提供了更‘实用’课程(手工技能、文书知识)的工人阶级却被前一种知识拒之门外了。”^[44]正是课程知识的“阶层”差异进一步塑造了他们对自身社会定位的认知。本研究发现,学生基本承袭了学校位置带来的自身定位“中等”的结构表述,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也认为自身在学业、心理上是“普通/中间”学生,权利等级化和比较是形塑“中间话语”的重要驱动机制。也正是该批学生,依据对位置感认可的程度,可将其分为敏感与负面、另类与反叛、接受与和解、合理化与认可4种类型,后两类相比前两类更认可中间位置。尤其是被学校分层驯化的学生,他们更相信优绩主义和努力改变命运的话语叙事。因此,本文认为学校教育通过结构塑造了个体心理特质,但这种影响也存在“自选择效应”,即在家庭和基础教育阶段已经塑造“中等/普通”特质的学生,无论其学业能力是否更出色,都更倾向或可能进入中等位置的学校。

(二)相关讨论

与已有研究只关注基础教育或者高等教育的两端,以及从教育学视角考察“中等学生”不同,本研究以本科生回顾性描述的自传方式串联起个体对相对完整和长期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经历的自我定位。除了既有研究关注学校层次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影响(尤其是名校)外,基于学生自我陈述,我们证实了高等教育分层结构对个体自我意识和价值的影响,学生将学校结构内化成自身叙事。等级结构塑造意识,从来就不是在某个层面和水平的学校能单独完成的,恰恰相反,各层次学校似乎像“约定俗成或有某种密谋一样”,它们静悄悄地手拉手,口口相传,“接力式”对学生自我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研究结论间接支持批判教育学者宣称的学校教育复制社会不平等的主张、隐性课程的权力对应关系,以及有学者提出的学校扮演“分类机器”的角色。

但本文也发现在中国国情下与“符应原则”不同的内容。其一,学校影响中有部分“自选择效应”,即个体对结构影响的回应。学业中等的学生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无视此种符应,相反他们有自己的实践逻辑“确保自己安全”。入学前的家庭或个人更倾向于保守和稳定的氛围,既有道德层面上也有心理层面的。中国的制度优势遏制了社会绝对不平等,因此学校教育体系仅复制了以学业表现和优绩主义为核心的符号不平等,也就是教育体系的等级制被合理化并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等级的承认。其二,学生并未将学校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进行严格对应,相反可能还会因为中间与“中产”模糊,他们既缺乏相应阶层意识,也对目前身份等级无危机意识或不满。此外,个体通常也会以学业作为自身努力和道德化自身的方式,无论是否进一步学业深造,至少他们曾有过进一步向上攀爬学业等级台阶的信心和勇气。其三,塑造中间叙事的驱动力既有批评教育学者支持的隐性课程或知识权力对应,也有本研究所发现的社会物理学(将社会用严格物理刻度进行评价)主宰学业等级和等第所带来的符号效应。正如布迪厄指出的:“构成某个阶层无意识的统一性,不是他们公开的意见,而是一种紧密依附,它是在习惯的最深处的品位和厌恶、同情和反感、幻想和恐惧。”^[45]对于这些学生而言,混合复杂兼具“中间”的心态是其鲜明底色。其四,鲍尔斯与金蒂斯等人提出的是一套基于不同教育层次(大学相对于高中)的对应原则,但本研究基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高校也发现类似心态和

定位的分层。这与中国比较明显的大学层级和符号以及以优绩和学业等级勾连的基础——大学教育制度有深层关联。近年来,在“精英大学寒门学子”的研究中,虽然也发现学生“不自信”“自我贬低”等看似“相近”的叙事,但名校光环下学生的语言明显有着自嘲和戏谑的成分^[46],而本研究关注的这群学生的中等叙事更是一种系统性的接受,一种结构化的承认。其五,结构会直接影响个体认知,但本研究发现基于声望和符号的权利等级化体系似乎对个体位置感的影响更为明显,虽然大学的隐性课程和知识可能也会产生影响,但在本研究中似乎并没有呈现应该呈现的影响。

(三)主张与展望

本研究并不是严格的政策研究,也很难产生连锁政策影响,无意也绝不会隐性地为学生赋值符号标签,所以我们更聚焦在学术层面去推动和呼吁对“中等学生”的关注。研究者认为后续研究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既有研究关注学生发展而聚焦学生的收获,却忽视更为重要的意义感和自我定位,后续研究要关注学校教育体系中等级制及其带来的对学生心态和自我认知的影响,将成绩视为一个连续体而不是简单的分层或分裂^[47]。尤其是学生受到标签化形象的长时段的影响依然存在,在乡镇/县—城市转换过程中还存在学业心态问题。(2)身处中间位置的学校和学生都应受到研究者或社会舆论的关注。得益于决策层对职业教育的重视,高职专科当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们相信中间位置的学校、学生声音和叙事也应受到关注。(3)我们呼吁有更多与《我的二本学生》相类似的作品诞生,不论其是学术期刊还是大众读物。研究者应扎根丰富的资料为该类学生和学校发言,而不是蜂拥至被名牌大学研究者牵着鼻子走也很难有建树的研究领域。

本文写作虽然间接地以 F 大学和 H 大学为比较,但在研究中我们避免了以 F 大学视角而居高临下的审视,摒弃了所谓的“精英的傲慢”,以中立、平和的情感,悬置各种主观价值,仅仅是客观地向大众呈现中间学生的自我陈述和叙事。在质性研究也追寻“差异化发问”的背景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研究者也深知“中间位置”的本科院校也并不完全同质,因为行业特色、地域区别等,中间层的地方本科学校学生,甚至是 H 大学内部学生(城乡、中西部等维度)的自我叙事也可能呈现其他特点。本文的立足在于试图提供一个地方本科学校的案例,后续研究仍可以进一步丰富中间学校学生的内心叙事内容,以及在考虑“自选择效应”基础上深入考察学校的实际影响。与学术界动辄以“结构互动”(主观能动性)和“复杂的机制”分析自我标榜以及“描述性误区”^[48]的批评不同,本研究旗帜鲜明地支持“少些理论,多些描述”^[49]的非主流立场。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描述分析仍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石”^[50]。本文仅是系列研究的初步探索,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中等/普通”概念或背后的“个体能动性”等问题进行理论提升和概念化。

参考文献:

- [1] 刘云杉. 自由选择与制度选拔: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培养——基于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4):3874.
- [2] 刘云杉. 拔尖与创新:精英成长的张力[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39(6):1027.
- [3] 段德金. 抓两头带中间:班主任工作初探[J]. 保山学院学报,1999,18(4):7677.
- [4] MASSEY D. Categorically unequal: the American stratification system[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2007:242.
- [5] WANG K, CHUNG C K L, XU J, et al. Can the locked-in be unlocked? university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under state-led quest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2022,37:420.
- [6] MILLER R, LIU K, BALL A F. Critical counter-narrative as transformative methodology for educational equity[J]. Review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2020,44(1):269300.
- [7] 沈洪成. 学校何以层级化:一个城区学校变动的案例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23,38(4):160181.
- [8] CHIANG Y L. Due distinction: elite student status hierarchies in Chin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7:1840.
- [9] GERBER T P, CHEUNG S Y. 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m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8(34): 299-318.
- [10] RODRIGUEZ C A, RUYSKENSVELDE S V. A rising tide of discontent: mediocrity, meritocracy and neoliberalism in American education, 1971—1983[J]. *Paedagogica historica*, 2023, 59(6): 1178-1196.
- [11] DOMINA T, PENNER A, PENNER E. Categorical inequality: schools as sorting machine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7, 43: 314-330.
- [12] HERMANOWICZ J C. The culture of mediocrity[J]. *Minerva*, 2013, 51(3): 363-387.
- [13] STANLEY G K, BAINES L. Celebrating mediocrity? how schools shortchange gifted students [R]. *Roeper review*, 2002, 25(1): 1-13.
- [14] BOWLES S, GINTIS H.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720.
- [15] 迈克尔·阿普尔. 意识形态与课程[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59.
- [16] PARK J. Hierarchical socialisation in a Jap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the formation of a sense of one's place[J].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2014, 17(2): 189-205.
- [17] 梁晨, 李中清, 张浩, 等.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 98-118.
- [18] SOUTHWORTH R S. The “average” student: an educational nonentity? [J]. *The clearing house*, 1966, 40(6): 323-328.
- [19] BROWN P. *Schooling ordinary kids: inequality unemployment and the new vocationalism*[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8: 37-90.
- [20] 托德·罗斯. 平均的终结: 如何在崇尚标准化的世界中胜出[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90-101.
- [21] WOODMAN D. Researching “ordinary” young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sociology of generations and the “missing middle” in youth research[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3, 18(1): 179-190.
- [22] ROBERTS S. Youth studies, housing transitions and the “missing middle”: time for a rethink? [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3, 18(3): 118-129.
- [23] GOODWIN J, O' CONNR H. Ordinary lives: “typical stories” of girls' transitions i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J].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2013, 18(1): 194-199.
- [24] ROBERTS S. Beyond “NEET” and “tidy” pathways: considering the “missing middle” of youth transition studies[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1, 14(1): 24-39.
- [25] ROBERTS S. “I just got on with it”: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of ordinary, yet overlooked, boy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2, 33(2): 203-221.
- [26] 李海华. “我”是中等生[D].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34-70.
- [27] 王萍. 让“灰色群体”色彩斑斓: 回应《不能愧对中等生》[J]. *思想理论教育*, 2011(2): 88-89.
- [28] 田波, 张慧. 对“成绩中等学生”的心理研究与教育干预[J]. *人民教育*, 2020(3): 2.
- [29] 勾馨悦, 叶桂斌. 从“沉默中等生”到“黑马尖子生”的突围之路: 一项个案研究[J]. *教育科学论坛*, 2023(10): 7-780.
- [30] COLLINS M. *Ordinary children, extraordinary teachers*[M]. Norfolk: Hampton Roads Publishing, 1992: 14-55.
- [31] HARVEY P F. “Everyone thinks they're special”: how schools teach children their social st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23, 88(3): 493-521.
- [32] BINDER A J, ABEL A R. Symbolic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how Harvard and Stanford students construct boundaries among elite universitie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9, 92(1): 44-58.
- [33] BINDER A J, DAVIS D B, BLOOM N. Career funneling: how elite students learn to define and desire “prestigious” jobs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6, 89(1): 20-39.
- [34] MULLEN A L. *Degrees of inequality: culture, class and gender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6-170.
- [35] CHETTY R, FRIEDMAN J, SAEZ E, et al. Mobility report cards: the role of colle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R].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1999: 499.
- [36] 李伟, 郭志辉. “开窍”与“自救”: 基于网络民族志的“二本学子”学历突围历程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6): 62-69.
- [37] KEMPPER R V, ROYCE A P. *Chronicling cultures: 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anthropology*[M]. Boston: Rowman Altamira Publishers, 2002: 20-58.
- [38] 风笑天. 论参与观察者的角色[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48(3): 39-44.
- [39] MATTHIESEN N, SZULEVICZ T. Mom, dad, and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ethics of conducting research based on your

- own children's everyday life [J].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2018, 49(3):329339.
- [40] SKELTON T. Research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explor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ethics, competence and participation[J].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08, 6(1):2436.
- [41] 郭丛斌,王家齐.我国精英大学的生源究竟在何方:以A大学和B大学2013级生源为例[J].*教育研究*, 2018, 39(12):99108.
- [42] 许涵,李德显.“别人家孩子”:一个被忽视的教育隐忧[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 20(1):102107.
- [43] 宫秀双,张红红.“别人家的孩子”vs.平庸的自己:社会比较对独特性寻求行为的影响[J].*心理学报*, 2020, 52(5):645658.
- [44] ANYNON J. Social class and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work[J].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0, 162(1):6792.
- [45] BOURDIEU P. *Distinc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77.
- [46] 刘钺,余秀兰,云如先.优绩主义陷阱的本土检视:从“上下有别”到“先赋应得”[J].*社会*, 2024, 44(4):2656.
- [47] GAYLE V, MURRAY S, CONNLEY R. Young people and schoo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ttainment: looking for the “missing middle”[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6, 37(3):350370.
- [48] 王宁.走出质性研究的三个误区:论青年研究的规范化[J].*青年探索*, 2022(3):4960.
- [49] BESBRIS M, KHAN S. Less theory more description[J]. *Sociological theory*, 2017, 35(2):147153.
- [50] 范晓光.描述分析仍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石[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328(03).

(责任编辑:吴朝平 校对:杨慷慨)

How the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Shapes the Sense of One's Place: Based on a Longitudinal Ethnographic Stud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WANG Weiping¹, YUAN Jing², WANG Zhisen³

1. *Institute of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0, China;*
3. *School of Educ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47405, USA*

Abstract: Compared to students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and local universities, students from non-elite universities seem to be doubly invisible in both academic and public discourse.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educational autobiography and longitudinal ethnography, and based on long-term qualitative research (2021—2024) at a comprehensive local college, the researcher integrates the core frameworks of Bourdieu's notion of “sense of place” and critical education scholars' principle of “correspondence”.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the self-perception of students at local universit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most student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construct a self-narrative of being “average/ordinary students”. Their explanatory discourses mainly revolve around two mechanisms: hierarchical power and social comparison. Faced with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stratification, they exhibit a combination of psychological sensitivity, early negative experiences, self-adjustment, and internal reconciliation. More importantly, they accept the ru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stratification game and are tamed by narratives of effort influenced by the institutional hierarchy. The structural position of a college with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cultural framework map onto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their own sense of place. While exceptions exist,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universities largely shapes students' perceptions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evolving into an often-overlooked mechanism and a normalized meritocratic order within society.

Key words: middle-ranking students; local universities; elite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autobiography;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